

开栏的话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的重要特征。党中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而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反映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坚持包容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平等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发展取向。《新女学》周刊今日起推出“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建言录”,邀请专家共同探究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共话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前景。

实现包容性发展,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

编者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的重要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的内涵、任务和路径进行了一系列深入阐释和重大部署。本文作者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出发,提出妇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者和受益者,妇女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而实现妇女包容性发展是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曹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重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进行了一系列深入阐释和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把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笔者认为,妇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者和受益者,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而实现妇女包容性发展是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追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思考共同富裕不能局限于经济收入,要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考虑进来。既要不断增加经济收入,又要实现精神富有、生态环境友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现阶段,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这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包容性发展,就是强调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发展机会上、发展内容上、发展成果上的公平、全面、共享;而包容性发展的达成,又要通过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来实现。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通过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补足发展短板,提高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增强整个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全面性。

推动妇女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

推动妇女走向共同富裕,就是要推动妇女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妇女群体,她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妇女群众基础的政治高

度,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和党的妇女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必须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充分发挥妇女的独特作用。中国妇女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扶贫减贫领域的生动实践。中国积极致力于贫困妇女脱贫发展,在经济发展、就业创业、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慈善公益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显著成果。在中国7亿多脱贫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妇女已占我国农村劳动力的60%以上,在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多元业态发展中大显身手,广大妇女已经成为创业增收、走向共同富裕的生力军。

脱贫攻坚的洗礼,极大地激发了妇女发展内生动力,妇女发展能力和发展环境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平等。这制约了妇女的发展和进步,制约着妇女走向共同富裕。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于男性,贫困妇女的就业机会更少;在同一行业,技术含量、地位和收入越高的岗位对女性的偏好也越低;即便在相同的岗位,女性的收入也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在社会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层面也存在性别不公正,具体表现在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等方面将妇女置于边缘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

因此,促进妇女的共同富裕,要解决妇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促进妇女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是指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的一种发展,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及发展成果的共享性。

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

妇女是脱贫攻坚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者和受益者。要建立有利于妇女发展的体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调动广大妇女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妇女走向共同富裕。

一是要促进农村妇女的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贫困妇女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过持续奋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人口特别是脱贫妇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面解决。截至2020年底,实现脱贫的近一亿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对贫困妇女的保障力度持续加强。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拓展女性就业渠道、提升技能水平、加强健康保障的政策和措施,为贫困妇女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重点任务就是促进农村妇女实现包容性发展。落实妇女优先原则,产业项目、就业岗位要向符合条件的妇女重点群体倾斜。

二是要促进妇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内涵与构成部分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每个人都能得到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从而显现为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饱满、自尊自强意识的张扬和奋发意志的昂扬。全面脱贫,经济维度的妇女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要解决心理、家庭、社会权利、发展能力等维度的妇女问题,仍然需要系统性政策安排。要推动妇女在教育、参与社会治理上的权利保障,提高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上的获得感,使妇女在精神文化需求上得到满足。

三是要提高妇女发展能力,通过自我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创造更加公平的条件,提升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探索妇女就业优先政策,为妇女提供职业培训,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新锐观点·青年学者扶助计划

她们如何跑外卖:平台劳动下的性别实践

· 阅读提示 ·

近年来,越来越多女外卖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传统的性别框架和性别分工被解构和重塑。女骑手们从动态的身份调试,到利用传统性别规范和平台化规制实现个人劳动利益最大化,再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社群连接,这样的性别展演凸显了性别与平台劳动的深层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未来平台就业实践中愈加展现自我能动性 and 主体性的可能。

赵宇超 张仟煜

近年来,女外卖员的身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愈发常见。据美团研究院调查,2020年美团平台女骑手的比例达到74%。在本研究开展的2021年北京市外卖员问卷调查中,女骑手的比重已显著提高到16.2%。送外卖由于低门槛、灵活自由、多劳多得的特质,越来越成为众多女性劳动者的偏好选择。但作为高密度、强控制、重体力的劳动类别,送外卖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以“职业性别少数”身份进入平台的女骑手们,既要与外卖劳动中强烈的男性气质博弈,也受到数字平台强烈技术中介性的影响,并持续承受着传统性别规范和性别分工的桎梏。本文试图从平台经济下女性外卖员的日常实践入手,探寻她们适应平台劳动的行动与经验,理解她们在此过程中构建的自我认知和性别话语。

成为女骑手:超越传统性别身份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被期待以家庭为重,可从事的职业集中于服务员、护士、幼师等情感性或辅助性强的领域,自身工作往往被认为 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女性加入平台劳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种单一的角色框架和性别认知。比如,在应对送餐高峰期的体力和耐力挑战时,女骑手们大多表示“别人能干自己也能干”“这个事(跑外卖)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劲跑”;在



宁夏女外卖员王婧登上了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来源:《银川晚报》

每天长时间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下,不少女骑手表示“挺好,省了买衣服的钱”;还有部分女骑手是受到丈夫送外卖后的耳濡目染而萌生念头,在配偶的鼓励下进入了外卖行业。

加入外卖行业后,一些女骑手不再固守家庭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被打破。很多全职女骑手表示自己承担的家务劳动并不多,会与另一半进行协商,最大限度地节约彼此的时间,实现双方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另外,祖辈照料的育儿模式也多出现在女骑手的生活中,她们会把孩子放在父母家照看。由此,很多女骑手都把“送外卖”的工作放在首位,职业身份而非性别身份成为其定义自我的重心。这种去性别化的劳动实践,突破了女骑手为家庭和孩子牺牲的传统认知,也超越了男性凝视下“女性靠脸而不能靠能力吃饭”的刻板印象。

除了个人坚持和家庭支持以外,平台中的劳动规定和技术准则也从客观上鼓励女性建立以“骑手”而非“性别”为核心的身份定位。当谈及应聘体验时,专送外卖员珊姐十分肯定站长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不乐意录用。而通过后台自主注册的骑手们,则更少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人职差异。平台的数字化招聘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外卖行业在进入关卡的“性别平等”;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化监管则采用接单率、路线、准点率、好评率等数据标准来维系劳动秩序,标准化、统一化、精准化的测算带来了几乎无差别的劳动体验——如兼职外卖员张希所言,“中午高峰期的时候就没有男女差异了,都疯狂地跑。”

女骑手的劳动策略:在性别标签下发挥能动性

朱迪斯·巴特勒在论述“性别展演”时指出,个体种种常态化的社会实践,都是一种展演行动,既受到性别规范的制约,也带有主体性和协商空间。女骑手的具体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性别规范的遵循、协商和利用呈现出丰富的张力。送外卖过程中,女骑手们不会一味选择证明自身不输男性的体力和能力,而是会积极寻求帮助。例如,有的餐品是矿泉水、西瓜等大件货物时,女骑手会主动向顾客或周边热心人士求助;遇到路途较远或难以定位的情况时,女骑手们也会积极联系男同事请求支援。

同时,灵活利用交流技巧、社交技巧等“情感劳动”经验,也是女骑手们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的策略之一。取餐、送餐路上及与保安、顾客交流中的话语和行动——等餐着急时,女骑手倾向于“慢慢说”来赢得饭店的配合;当不被允许进小区时,女骑手会“嘴甜”地向保安解释;送单超时引起顾客不满时,女骑手们大多笑脸迎人,通过专门发短信等方式来耐心交流、获得谅解——展示了女外卖员们基于更强共情能力的劳动智慧。虽然女外卖员的体力弱、耐心、善于沟通、妥协等是传统性别标签,但在平台严苛单

一的算法管理下,这些标签反而为女外卖员在复杂的劳动场景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女骑手社群的建立:集体话语与身份认同

不同于男骑手的随处可见,女骑手们较难在送餐途中发现女性同伴,加入的外卖群聊也较男性骑手更少。但女骑手们往往会利用平台劳动中存在的连接机会,与其他女骑手建立紧密的、在场的、深度的社交关系,从日常有仪式感的互动分享中,获得对自身“女性+骑手”身份的认同。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指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文化、价值观和身份共享的一种“仪式”。通过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媒介化实践,女骑手们在互动中相互扶持,形塑了群体间的认同,增加了集体话语的表达。在微信群里,她们几乎都以姐妹相称;清晨,伴着群里接龙似的“早上好”问候或群友们的定位,女骑手们陆续开工;午高峰过后,群员又会掀起一轮“晒单”高潮;遇到恶劣天气时,女骑手们会嘱咐彼此注意安全;她们聊天的内容也不止和配送相关,而是包括婚恋、养生、美容、育儿等丰富话题。

此外,女骑手们也会尝试多媒体发声,向外界传递“自立自强”的集体话语。在深圳龙岗区,顾大娟用两年的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团队由十几名女性外卖员组成,拥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账号,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女骑手发声文化(call-out culture)。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策略和送单过程,经常也会穿插一些集体表演——例如,大娟会和队员们一起策划动作,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在镜头前展现女性送外卖的酸甜苦辣。“努力工作,开心生活”“没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之类的字幕也常在她们的视频中出现。

数字化、媒介化的平台就业既丰富了性别议题的场景,也使性别劳动的阐释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平台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女性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但也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在中国平台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看到女外卖员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体——她们利用平台劳动的机会和机制来积极争取自我收益。同时,女骑手们从动态的身份调试,到利用传统性别规范和平台化规制实现个人劳动利益最大化,再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社群连接,这样的性别展演凸显了性别与平台劳动的深层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未来平台就业实践中展现自我能动性和主体性、重构性别话语的潜能。

(赵宇超为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张仟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研究视窗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肖巍 石珊

纵观2015—2020年中外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伦理学嵌入政治、生命、教育等与当代女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主题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重要课题。在政治方面,各国学者结合女性主义伦理学理论,为公共政策的提出、家庭关系的建立以及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措施提供了新路径;在人类生命的探索上,女性主义学者一直跟踪科学技术发展研究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在教育方面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关注到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新的理念和设想。本文作者认为,女性主义伦理学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只为性别或者只为女性服务的学说,它所强调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打破了以理性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冰冷关系,突出了经验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这种以联系情景和描述性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思考方式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我国农村妇女地权的百年变迁》

作者:李慧英

本文通过对近百年中国妇女地权(包括耕地权与宅基地权)的历史变迁进行探讨,将其百年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地权(仅限于耕地权)的提出与推进,中国共产党是妇女地权的倡导者与组织者,农村根据地与解放区是妇女地权的实践场域。第二个阶段是集体经济建立时期,随着人地分离,妇女耕地权议题告一段落,转向男女劳动的同工同酬。宅基地分配成为集体经济分配的内容之一,采取社员讨论表决的方式,导致男娶女嫁的乡村组织结构固化,为后来剥夺妇女地权埋下了隐患。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土地承包时期,随着土地回归家庭承包使用,资源分配权交由村民多数决定,农村妇女与传统性别力量的博弈与冲突持续不断,成为近40年乡村社会的尖锐矛盾。为了打开这一死结,性别研究专家、基层民众以及地方官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统账”与NDC模式下女性养老金水平差异》

作者:祁玉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面临着养老金收支不均衡等问题。面对养老金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既要讲究效率,又要兼顾利益的均衡,更要考虑到女性养老金权益的保障。本文通过对目前现行“统账”模式和学者普遍推崇的NDC模式下养老金性别差异因素对女性养老金水平的影响的分析,构建两种模式下的男女养老金替代率模型,并通过数据具体量化了养老金权益的性别差异后发现:提高退休年龄有利于男女养老金替代率差异的减小;养老金收益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男女养老金水平的差距。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范语晨 整理)